

论 1949-1976 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

汪树东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文学如何书写自然,往往最能彰显它的精神品质。1949-1976年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基本立场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意识除了在牛汉等人的潜在写作中尚有一定的表现外,整体性的生态视野基本沦丧。这无疑是革命意识形态与生态意识冲突的显示,这需要我们做出及时的清理与反思。

关键词:革命话语;生态意识;自然书写;生态视野;人类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5-0179-05

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人怎么设定与大自然的关系,人类文明就会呈现出相应的方向。文学作为人类最富灵性的文明样式之一,与大自然的关系讳莫如深。文学如何书写自然,往往最能显示它的精神品质。从1949年到1976年,主流革命意识形态覆盖整个中国大陆,无论是人还是大地的面貌都受到极其深刻的影响。本文从生态意识角度审视此阶段文学的自然书写,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视野的沦丧是基本特征,而牛汉等人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则非常珍贵。

一、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

如果从文学史高度来鸟瞰此阶段文学,我们必会讶异地发现它描绘大自然的文字竟是如此稀少。此阶段最经典的长篇小说《红岩》、《红旗谱》、《红日》以及《创业史》、《青春之歌》等几乎很少有对大自然的诗意描写,就更不用提那些声响宏壮的政治抒情诗以及几近歇斯底里的文革样板戏了。此阶段文学的主色调是红色,是革命的象征,暗示着激情,也暗示着鲜血和死亡,而大自然的主色调绿色无疑更与鲜活的生命相关,绿色的缺失是此阶段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局限。

此阶段文学的自然书写有极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特色,即基本不承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肆意地把人类的意愿和价值强加在大

自然身上,表现出对大自然极端的政治化、道德化、功利化的态度。刘白羽散文《日出》的主体是精心描绘作者在飞机上看到的一次辉煌的日出景象。应该说,那种惊心动魄的日出景象是大自然最美的展示,带有宇宙大生命本身的神秘和神圣,但作者并不是由此表达对宇宙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和亲近之意,也不是由此获得超越人类阶级、民族、国家纷争之上对宇宙大真理的领悟,而是把辉煌的日出景象看成新中国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干预下最终诞生的象征,从大自然磅礴无涯的气象中引申出非常有限的政治意义。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体验方式无疑是人类中心主义支持下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表现。这种情况在杨朔散文中也一样。散文《雪浪花》从浪花把礁石侵蚀得千疮百孔这样的自然现象中引申出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韧性和毅力。非常鲜明的托物言志的抒情方式都是对大自然的政治化阐释,显示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旨趣,摒弃了更为生动的自然灵性。

自然书写的人类中心主义特色同样表现在对大自然的道德化书写中。大自然的生态规律往往超出人类狭隘的道德范围。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人类不应该仅从自身的道德视野来看待大自然,反而应该适度地向生态规律扩展自身的道德视野,尤其是对待大自然本身时。郭小川在《青松歌》中写道:“而青松啊,/决不/不与野草闲花为伍! /一派正气,/一副/洁骨;/一片忠贞,/一身英武。//风来

* 收稿日期:2010-03-10

作者简介:汪树东(1974-),男,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了,/杨花乱舞;/雨来了,/柳眉紧蹙。/只有青松啊,/根深叶固!”^{[1]195}这种依据革命道德书写大自然的方法很明显违背了大自然的生态规律,而一旦违背了生态规律,作品的诗意也大为减弱,大自然的生动气韵被人类狭隘道德的呆滞容颜挤兑。

对大自然的功利化书写更是此阶段文学的显著特色之一。人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是寄生者,他只有利用大自然的特色东西来满足自身才能生存,对大自然适度的功利态度是不可避免的,但文学书写则另当别论,文学应该引领人超越对待大自然的功利态度,让人在精神审美领域与大自然重建和谐关系。诗人冯至在诗歌《戈壁滩》中写道:“千古著名的甘州、凉州,/本来不过是较大的绿洲,/现在却要变成现代的城市,/要拥抱几十万的人口。//怎么能拥抱这么多人口?/祁连山好像给我们回答:‘我的积雪创造了这些绿洲,/我的矿石保证了绿洲的扩大。’”^[2]大自然供养更多的人口便是价值的实现,而诗人完全不顾及大自然本身的价值以及生态系统承载人口的极限。现在若关注一下祁连山一带的荒漠化趋势,就可以发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祸害了。此阶段文学中,人们若要歌颂大自然,譬如歌颂某座山,必定是歌颂它提供了多少木材、矿藏,或者曾经为革命者提供过庇护,歌颂的结果就是大自然的被凌辱,被剥削,被摧残,乃至被毁灭。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完全没有进入人的视域。

此阶段文学中,作家丧失了对大自然最基本的敬畏之情,彰显的往往是无知无畏、凌驾一切、对大自然颐指气使的现代人形象。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的许多民歌最能代表那个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自我想象。陕西安康有一首新民歌《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3]这种写作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膨胀起来的人类意志在大自然面前极其狂妄。

这种膨胀起来的现代人形象最符合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任何偏离它的人都会受到规训。郭小川写作《望星空》就是如此,这首诗写于1959年,想必诗人也曾偶尔失望怅惘,诗的上半部分试图对那种极度颐指气使的现代人形象提出质疑。在大自然的永恒和壮丽面前,诗人自感渺小,恢复了对大自然的敬畏。然而,郭小川的怅惘很快受到了批判,大家普遍觉得他不是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就是陷入了虚无主义。其实,诗人在诗歌第三、四节中很快就摆脱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欣赏,抒情主人公融入了天安门前火热的斗争生活,感受

到了革命集体的力量,更感受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绝对主宰地位。

人与大自然的斗争一直是现代文明的主要方向,阶级斗争强调的是人对人的暴力斗争,而与大自然打交道的方式也是暴力征服式的,这是现代性的暴力本质的充分流露。为了与时代精神相应合,此阶段文学几乎有意无意地充分展示大自然对人类而言的负面阴暗形象,常常把大自然看作是所谓阶级敌人同出一路的角色。漫天卷舒的乌云,震耳欲聋的响雷,直劈苍穹的闪电,气势磅礴的暴风骤雨,无遮无拦的狂风暴雪,渺无人烟的沙漠和荒野,死寂的森林,波涛汹涌的大海,巉岩兀立的峰顶,席卷一切的滔天洪水,好勇斗狠的豺狼虎豹,阴鸷凶狠的蛇蝎鹰鹫,四处遍布的蚊蝇麻雀……。征服大自然,向大自然开战等,成为此阶段文学中自然书写的关键词,中国文学第一次充满着如此惊天动地的改造自然的巨大声响。大自然成了人民的头号敌人,地球成了必须向之宣战的对象,这种极度狂妄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终于把人类中心主义推向极端,并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生死相依的生态关联彻底抛弃。

二、生态视野的沦丧

生态意识的出现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乃是人类的自私本性的无限放大,这使人显得既不道德也不明智,若任由其发展下去,人类将不可避免地摧毁大自然,同时也毁灭自己。生态意识要求人充分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要求人类尊重其他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尽可能控制自身的欲望,让人类的发展意志与生态规律相协调^[4]。当然,此阶段文学还基本上不可能具备这种生态视野,许多生态问题被革命话语轻易而想当然地遮蔽了。

此阶段文学中,农村题材小说和工业题材小说非常普遍。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是人与大自然打交道最直接的实践活动,人的自然观往往决定了这种实践活动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但这两类小说几乎不去写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们更关心的是在与大自然交往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大自然作为人的所有物的所有权问题。像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浩然《艳阳天》等农村题材小说,艾芜《百炼成钢》、草明《乘风破浪》、萧军《五月的矿山》、周立波《铁水奔流》、雷加《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等工业题材小说,其共同特点就是现代化崇拜,即理所当然地把大自然视为人类可

以任意攫取的资源库,至于现代工业化给大自然带来的生态问题还完全没有进入视野之内。《山乡巨变》中有一个细节颇能反映此阶段文学中自然书写的偏向,清溪乡在邓秀梅等人领导下准备开始搞更高级的合作化运动,自然受到所谓阶级敌人的反对,暗藏的阶级敌人龚子元悄悄放出谣言说山林也要毫无代价地归公,于是,清溪乡出现了一夜之间大肆砍树的一幕。这种对大自然的破坏在此被视为反动阶级的恶意指导和私有制培养出来的人的自私本性造成的,潜藏的话语自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就能制约人的这种自私本性。但这里的关键明显不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的问题,而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一旦想当然地无视大自然本身的价值,他就必然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夺大自然,尽可能地增加人口和提高消费水平,历史证明公有制对大自然的剥夺远比私有制更为可怕。

其实,生态问题并不因人的忽视就不存在,它只不过是革命话语遮蔽了。此阶段按照革命话语翻译整理的蒙古族长篇叙事诗《嘎达梅林》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嘎达梅林悲剧故事的基色乃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草原是大自然经过成千上万年来慢慢进化出来的生态系统,特定地域出现的草原暗含着大自然的最高最深的智慧,人不能任凭主观意愿改造大自然,否则大自然的惩罚将是严厉的。史诗叙述了科尔沁蒙古族王爷和官府勾结,要把草原出卖以供开垦,而嘎达梅林的起义既是为了穷苦的草原牧民谋求生路,也是为了保护草原生态。但嘎达梅林起义最终失败,科尔沁草原被出卖开垦,没过几年就完全退化为沙地,根本无法耕种,人终于因为忽视大自然的生态规律而自掘坟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嘎达梅林起义乃是一场生态起义,是有良知的人为了保护无告的大自然而向少数人的荒唐和麻木宣战。但这种人与大自然的生态关系,在根据革命话语整理的长篇叙事诗中却被遮蔽了,它着重强调的是嘎达梅林代表下层民众的反抗决心和力量,抨击的是上层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巧取豪夺,被当作“反抗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悲剧故事”^[5],似乎与大自然毫无瓜葛了。

此阶段文学对动物形象的书写也缺乏生态眼光。《红旗谱》中有一个颇为重要的“脯红鸟事件”,很能反映这一问题。运涛、大贵等人在棉花地里逮到名贵的脯红鸟,按当时市值大约能换一头牛或一挂车。冯兰池看上了这只鸟,想据为己有,大贵却不买账,决不出让给他,最后让家里的猫给吃了。在梁斌写来,反映的是地主阶级的仗势欺人,是农

民阶级敢于反抗而不服输的阶级本色。但此事件还涉及到那只稀罕的或许是濒临灭绝的脯红鸟却在阶级斗争话语中沉默无语,大自然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共同抢夺的对象。其实,从大自然角度来看,无论是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都是大自然无情的掠夺者和侵犯者。脯红鸟远离大自然,沦为人的玩物,对于大自然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可悲的价值沦丧,两个阶级的斗争最后殃及池鱼,致使大自然受到致命的创伤。

此阶段文学还存在鲜明的物种歧视之嫌,在“除四害”全民运动中达到荒诞的顶点。田汉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畅想着20年后(也就是1978年左右)在中国臭虫、麻雀、耗子和苍蝇已经成为稀有动物了。李古北在《奇迹》中叙述了大跃进年代里的一个奇迹般的故事。某县堂上村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模范村,他们已经根绝了四害,号称“太阳村”。村支书陪同省爱国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到村子里检查工作时,居然发现了一只麻雀,于是发动全村社员四处搜寻,花了两天工夫,累得精疲力竭,终于在一棵老槐树的窟窿中活捉了麻雀,村支书大发感慨:“我一看见麻雀就眼红,不管在哪里,当着什么人,非喊不可,已成了改不掉的习惯。麻雀是害虫,它吃粮食,你不知道吗?”^[6]这与其说是那个时代群情激昂的喜剧,不如说是人类意志膨胀到极点的荒诞剧。社会主义就这样大力推行物种歧视,人与大自然的对立居然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升到本体地位。当它可以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来对付一只小小的麻雀时,从大自然的角度看,这岂不是人类最令人发指的法西斯行为?

荒野自有内在价值,野生动植物同样享受着宇宙大生命的艰辛和欢乐,但此阶段文学几乎不能欣赏荒野的野性之美。郭小川《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写50年代转业军人到北大荒开垦农场:“这片土地哟,一直如大梦沉沉! / 几百里没有人声,但听狼嚎、熊吼、猛虎长吟; / 这片土地哟,一直是荒草森森! / 几十天没有人影,但见蓝天、绿水、红日如轮。……野火却烧起来了! 它用红色的光焰昭告世人: / 从现在起,北大荒开始了第一次伟大的进军! / 松明确点起来了! 它向狼熊虎豹发出檄文: / 从现在起,北大荒不再容忍你们这些暴君!”^{[1]175}狼熊虎豹作为荒野的生灵并不是暴君,它们维系着荒野生态系统的活力和魅力,但这些野生生命的内在价值与荒野的价值并没有进入诗人的视野。当人把荒野的野性纳入到人性和文化之中时,人性和文化无疑将会更为丰富和阔大;而当人拒不接受荒野

的内在价值,只试图把人类的价值意愿强加其上时,对于大自然和人来说,那都是不幸的灾难。

三、珍贵的生态意识

按照阿伦·奈斯的划分,生态学思想可以分为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前者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相信科学技术的力量,强调保护环境仅是为了人类长远利益;后者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承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主张对现代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性反思^[7]。这种浅层生态意识在此阶段文学中都极为稀少,因此当秦牧在散文《大象哀歌》中写到非洲大象遭到猎杀濒临灭绝时,我们不得不表示由衷的兴奋。当然,作者并没有保护动物的意思,更没有为无告的大自然鸣不平之意,而是说:“我写下这些,难道是在提倡什么对野生动物的人道主义么?不,对于某些自然资源的保护,实际上也是有思想有觉悟的人民对于人类长远的根本利益的保护。滥杀野象,体现的是帝国主义者们的骄横,对于小国主权的蹂躏,以及资本家们唯利是图,践踏一切人间合理原则的丑态。这样的事情,从又一个方面显示了资本主义势力的罪恶。”^[8]作者还是在浅层生态意识上理所当然地把大自然当作资源库,强调保护大自然是为了保护人类的长远利益。而且,作者特别从非洲野象遭猎杀这件事中看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这就更把政治意识形态之争置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之上。

1962年,孙犁写了《黄鹂——病期琐记》,委婉叙述了与黄鹂的几次交道。黄鹂是大自然极美的生灵之一,值得人珍惜呵护。他在疗养期间就劝人不要打黄鹂,对有人仅是为消遣就射杀自由飞翔的海鸥表示愤慨,对有人笼养黄鹂表示蔑视。他希望这些美丽的生灵能够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安居乐业:“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这就是形色神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9]这是健康优美的心灵自然萌生出来的宝贵的生态意识,拒绝把大自然中的生灵当作人类的玩物,希望它们能在大自然中充分展示生态之美。

此时期主流文学基本上都是对大自然或加以排斥,或加以贬抑,但另有两类作家却开始更充分地发现大自然^[10]。这就是50年代末开始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许多已成名的右派作家,文革中大批下放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知青作家。知青作家的创作和影响要到80年代才出现,而右派作家则大量

地潜在写作,在文革结束后产生巨大影响。牛汉在70年代初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期间创作了许多诗歌,《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鹰的诞生》等,是当代诗歌中极富骨力底蕴的好诗,大多具有非常珍贵的生态意识。

牛汉诗歌的生态意识首先表现于对大自然生命内在价值的认识和尊重。他诗歌中的老鹰、老虎、麋子、枫树乃至路边遭人践踏的车前草、山中屡遭芟夷的灌木丛,都是大自然种种美好而价值自足的生命形式。《鹰的诞生》充分关注大自然本身的美,关注大自然的内在价值,诗人对鹰的歌咏既不是出于鹰如何卫护了人类的利益,也不是出于鹰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如何重要的位置,他瞩目的只是大自然恰好创造了这样一种生命形式。当人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其实不难发现这种生命形式并不比人类差多少,它以独有的方式见证着宇宙大生命的辉煌与精致。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诗人对老鹰这种生命形式的景仰,诗人通过对野性生命的深度理解和欣赏,更深地拓展了人类精神的内在空间,使人性显得更为婀娜多姿,而不是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使人性显得狭隘而局促。《麋子》是诗人怀着对大自然最深切的爱的表现,在金黄的麦海里飘飞的那只麋子多像大自然的精灵,它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构成恰如其分的和谐景观,把大自然的生动气韵展现得淋漓尽致。诗人正是出于对麋子之美的赞叹之情,才很快想到那些猎人正埋伏着而为麋子的生命担忧。诗人已经充分体验到了大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人的欲望不再是无限制地指向大自然生命,而是在精神层面上开始欣赏自然生命的内在美。

正是因为牛汉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能充分地体认大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他才那么关注大自然生命受到的伤害。他曾说:“大自然的创伤和痛苦触动了我的心灵。”^[11]《华南虎》可以说是关于动物受人类残害的一首绝唱。那只被从苍苍莽莽的山林中捕捉来的华南虎有着斑斓的面孔、火焰似的眼睛,是多么高贵华丽的自然生灵。但人类却把它关进铁笼子里,放在动物园里赏玩,这对于人类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可要是从大自然角度来看,这岂不是人类的十足罪恶!诗人有意把参观的人类和被囚的老虎加以对比,那些参观人群叽叽喳喳,胆怯而绝望,而老虎却显示了对人类十足的鄙视和冷漠。人类的琐碎无聊和老虎的威严高贵判若云泥。《悼念一棵枫树》在那个时代里也是绝无仅有的生态文学的华美篇章,人们的目光都集中于所谓太阳

一样的伟人，神一样的英雄，谁会去关注一棵被伐倒的枫树呢？但诗人却怀着对大自然生命的深挚之爱，为那株被人类伐倒的枫树哀惋不已。

牛汉对那些伤残的自然生命怀着深切同情，更为那些自然生命的旺盛力量感奋不已。《半棵树》中，诗人注目于那棵被雷电劈掉了半边的树，自然生命那种笑傲风雨雷电的气概值得人类钦敬。《巨大的根块》写的是南方山区里那些年年遭砍伐的灌木丛，有半年的时光只靠短秃秃的树桩呼吸，这种生命强力正是支撑着绿色世界的力量，人类的意志强力必须与这种大自然的生命强力一致，去促使生命的和谐与繁盛，而不是造成死亡的单调和荒芜。当然，牛汉有时也会显露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和偏执，如《蛇蛋》中对蛇的偏见，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四、沉重的反思

虽说有牛汉等作家的潜在写作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亲近和爱护，生态意识得到表达，但整体上此阶段的主流文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张扬，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极端崇拜，对大自然的极端侮辱和侵袭，这的确需要深入反思。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哪个时代对大自然不感兴趣时，这个时代的文学往往就会陷入灵性枯竭之境，或文学的内在景象就会被人的颓败气息充满；哪个时代对大自然极感兴趣，与大自然相融得当，这个时代的文学往往就会呈现出十足的灵性。大自然的颓败总是与人的精神的颓败唇齿相依，而大自然的兴盛也与人的精神的兴盛息息相关。把这个现象验之于此阶段的中国文学，无论我们曾经对此阶段文学做出多大多高的评价，若从长远文学史眼光来看，它在中国文学史中无论是在精神质地还是在艺术水平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滑落和低谷。也许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剖析这个低谷形成的原因，但其中的自然书写所显示出来的对大自然的完全缺乏生态意识的态度，必定是巨大而且是根本性的缺陷。对大自然的颐指气使必然导致对

生命灵性的拒斥，必然导致文学内在灵性的沦丧。也许从长远的文学史眼光来看，真正具有价值的倒是那些下放农村或偏远地区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无意疏远，对民间和大自然的发现，对内在精神的反视和沉思，使他们的作品慢慢恢复了具有灵性的精神质地和艺术品格。

当然，文学毕竟是对现实的反映。此阶段文学呈现出那种对大自然的狂热和无知，反映了人对待大自然的现实态度。尤其是立足眼前生态危机频仍的现实，回顾那段历史，我们不得不为前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感到痛苦和无奈。现在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自然环境的破坏也许在此阶段是最可怕、最具摧毁性的。大炼钢铁，大跃进，知青和军队的垦荒，以及完全没有限度的现代化工业崇拜，没有任何生态意识的人口剧增，这些与大自然为敌的历史行为的恶果，如今正落在我们民族头上，让生活变得日益枯燥沉重，让精神变得日益粗疏荒芜。这是我们必须及时反思的。

参考文献：

- [1] 郭小川. 郭小川诗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 [2] 冯至. 冯至选集：第1卷[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210.
- [3] 郭沫若，周扬，编. 红旗歌谣[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59.
- [4] 李国. 机械论范式的有机论转向[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72-76.
- [5]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 中国当代文学：第1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315.
- [6] 李吉北. 奇迹[G]//二十一所院校编写组. 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312.
- [7] 雷毅. 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31-34.
- [8] 秦牧. 秦牧选集[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85.
- [9] 孙犁. 晚花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102.
- [10] 汪树东. 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的来源[J]. 天府新论，2009(3)：140-144.
- [11]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4.

责任编辑 韩云波

On the Natural Writing Between 1949 and 1976

WANG Shu-d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e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e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How the literature writes the nature shows easily its inner quality. In the period from 1949 to 1976, the natural writ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founded on the anthropocentrism. The eco-consciousness has not been exhibited besides Niu han. The ecological view has not brought into being in this phase because of the ideology of revolution. Thus, we should put it in order and reflect it.

Key words: ideology of revolution; eco-consciousness; natural writing